

难忘的清华园歌声

○钱 祥（1958 机械）

1953年，我从上海市西中学毕业，考上了第一志愿的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当时江浙一带1400余名新生乘坐专列赴京报到。到校后受到盛情有序接待，在新生登记处办好手续，很快在宿舍区空地上领到了托运的行李，效率之高令人惊讶，这是我到清华的第一感受。

一天到理发店去，从旁侧灰楼中传出嘹亮的《黄河大合唱》歌声，我好奇地上楼一看，满屋是激情高歌、情绪投入的合唱队员，还有管弦乐队伴奏，担任指挥的是一位胖而结实、精神抖擞的老师（后知道姓周）。中学时代我就很喜欢唱歌，但此情此景是第一次看到。不久我就报名参加合唱队，经试音被编入第一男低音（男中音）声部。从此这个称为灰楼的音乐室就成为我除图书馆外最常去的地方。

合唱活动使我结识了许多各专业的同学，平时大家分散在各处学习，排练时聚合一起，通过一次次磨合，不仅达到了曲目要求，还提高了相互配合的合唱技艺，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关心团结的艺术集体。当时合唱队中8字班同学不少，有水8的平雷，房8的朱佛佛、邵则玉，物8的杨恩熙，电8的方世琦和我等，后来都成为合唱队的骨干。后来我入团时，大家还送我一本《得奖歌曲集》，并在扉页上签名作为纪念，可惜在几年前搬家时丢失了，但歌友们的真情将永留心中。

为提高演唱水平，合唱队还选择一些同学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老师来校进行个别辅导，每周六一次，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很快提高了唱歌技巧，还经常承担领唱、独唱任务。

当时俄语作为唯一外语，唱的歌有很多俄罗斯歌曲，至今我仍然非常喜欢。记得有次苏联青年代表团来校访问，在校体育馆举行的欢迎会上，合唱队演出后，我用俄语独唱了一首《俄罗斯》，获得代表团热烈鼓掌，并与代表一一握手，还给我佩带纪念章，赠送了莫斯科大学漂亮的明信片。



合唱队同学去颐和园游玩合影，前排左起第2人为作者

随着参加合唱的同学日益增多，加上演唱曲目需要，就扩建了混声合唱队和男声合唱队，当时正值在京举办由苏联专家杜马舍夫主讲的全国合唱指挥

培训班，著名指挥如秋里、司徒汉、施明新等都来了，同时也成立了北京大学生合唱团，各大学的合唱队也成为各位指挥的“实习基地”，如我校男声合唱队就请来了吉林延边朝鲜族歌舞团的朴佑当客席指挥。由于人数众多，音乐室已容纳不下，改在第一教室楼的阶梯教室举行合唱活动。面对这三个合唱组织，我都参加了，排练、演出几乎占用了我除专业学习外的全部时间，有时要到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才回宿舍。

当时全校性演出都在大礼堂举行，后台很小，我们人多，必要的化妆准备都在礼堂后门外空地上进行。我也常参加各种形式活动，有时搞演出很简单，在饭厅空地上同学形成的观众圈就是舞台。记得还去西郊苏联专家招待所访问，我们即兴演唱的俄罗斯歌曲深受欢迎，有时合拍同唱，洋溢着中苏人民的深情厚谊。回校已是夜深，大家毫无倦意，一路唱到清华园。在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教学活动中，教唱歌是我的额外任务，歌咏使我们与群众关系更贴近融合。

最为难忘的是1957年五四青年节，在中山公园游园晚会上，毛主席与刘少奇、彭真等国家领导人陪同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观看北京大学生合唱团演唱《莫斯科—北京》，我和廖庆园（热9班）等四人选为领唱，由于站在前面，距离毛主席更近，那时也没有返听扬声器，听不到演唱效果声，只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



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清华同学与专家合影，第一排（蹲）左起第5人是钱祥

使劲高声唱，唱完之后，毛主席和苏联贵宾热烈鼓掌。

毕业前夕，学校公布了分配方案，供大家填写志愿，当时我报的第一、二、三志愿分别是服从祖国需要统一分配、云南边疆、江苏省中小型地方企业，自己做好了到云南的准备，并写信请母亲做一条厚些的棉被，以适应边疆气候环境。后来，系分配小组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到广播事业局上海中国唱片厂报到。这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开，都说与热爱唱歌有关。记得火车上毕业分配去上海各单位报到的共27位清华同学，与上学时乘车人数相比是少多了，同学们都奔赴了全国各地。

中国唱片厂是中央直属企业，我是解放后来厂报到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在电唱机技术基础方面是一片空白，在上海图书馆资料中我发现许多历史文献，包括大量的“国际声频工程学会”学术论文，都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我就如饥似渴地泡在图书馆，查阅、复印了百余篇文章，凭借

□ 我与清华

中学时代英语基础，加上自学广播英语，终于逐步掌握本专业英语资料阅读能力。结合在校学习“高等数学”、“力学”等基础知识，联系实际分析应用，掌握了电唱机设计的基本技术。我写了十余篇文稿发表在《电声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等专业刊物和众多科普杂志上，同时在电子工业部出版的《广播电视工业综览》和《国外电子工业概览》手册中撰写“电唱机与唱片”条目。上世纪60年代，上海声学学会在科学会堂举办“立体声技术”讲座，我主讲“立体声唱片和唱机”部分，受到热烈欢迎。在电子工业部全国电声情报网会议上，我经常介绍唱片、唱机国外动态和新技术，同时还被聘为《电声技术》的唱片、唱机文稿编委。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出现大规模学习外语高潮，那时国内盒式音带尚未普及，一台电唱机加一套“灵格风”英语学习薄膜唱片成为市场抢手货，后来发展到凭票



在上海工具厂实习时，钱祥指挥该厂职工歌咏队练唱

供应。光靠一台进口的薄膜压片机已不能满足需要，我就和工人师傅一起日夜苦战，利用液压传动原理知识改装厂内普通压片机，试制成国内第一台全部使用国产元器件的全自动薄膜压片机，一时全国掀起了电唱机和唱片的生产高潮。为规范生产管理，我又参与主持制订电唱盘、唱针国家标准工作。

参加工作后，我仍然是一个歌咏积极分子，协助工人师傅排练合唱节目，逢年过节常上台演唱、担任领唱等，同时还参加了上海业余广播合唱团，经常参加全市性的大合唱。有一次，著名指挥司徒汉认出我，回忆起曾指导过我们合唱，还特别提到唱第三男低音的赵玉正。赵是我制8班同学，诗歌朗诵在全校有名，音域很低，声音厚实，合唱中虽该声部呈现不多，但胜任的人极少，可惜他已于几年前去世。

退休后，我仍一直在音响领域工作，回想起在校喜爱唱歌，那是发声，在唱片厂工作是从声音的记录和重放，而音响领域是扩声，都是围绕一个“声”。从广义说，这中间也有一定关联，个人爱好能与工作联系起来那是非常愉悦的事。至今，我已在安恒利公司受聘顾问十余年，主要从事翻译及内刊编辑工作，其中《语言可懂度》、《纵向线阵列扬声器》曾发表于《电声技术》刊物上，并在上海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上被授予“优秀员工奉献奖状”。公司全体员工团结奋进，曾完成许多国内重大音响、灯光工程，如“北京六十周年国庆庆典”，“国家大剧院”、“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校百年庆典盛大联



毕业 50 周年返校活动后合影，左起：程司潜夫人、程司潜、王大中、钱祥、杨南祥

欢晚会上扩声系统设备也由我司提供并给以全力支持。

毕业 40 周年返校时，曾由郑小筠教授陪同参观清华艺术教育中心，那条件真是今非昔比！当时正值“艺友合唱团”活

动，有位老歌友还和我回忆起当年参加合唱队的难忘岁月。今天，清华除了有完善的艺术教育中心，更有设施先进的新清华学堂和音乐厅，为清华学子提高文化修养提供了一流的设施厅堂。

清华百年校庆，歌友们相聚在音乐厅，很遗憾我未能参与。从演出后集体照中，我认出了不少老歌友，如王家驹、曾点、杨景芬、方世琦以及郑小筠等。从《清华校友通讯》中我也读到过平雷、赵修民、曾点写过的文章，虽然他们写的是各自经历，看后却使我联想起在清华共同参与的歌咏活动实践。

我深深感谢在母校受到的全面教育和培养，让难忘的清华园歌声永远在心中回荡。

我与王敬的相似人生路

○杨俊林（1966 汽车）

我与王敬是清华 1966 届汽车专业汽 61 班同学，为纪念清华百年校庆，我俩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从南京乘同一趟火车回到母校与同学相聚。一转眼毕业 45 年了，很多同学还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激动的场面真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大家在一起回忆的是毕业 45 年的风风雨雨，而我与王敬在一起回忆的却是我们近 70 年来相似、相近、相同的人生路，同学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叹。近 70 年来，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像有一面无形的镜子在相互反射，镜外有我，镜中有他，形影不离。

我是父亲早逝投靠姨妈家，他是父亲

早亡靠舅舅养大。我是阴差阳错进太原十中，他是为离家近转十中。

我是 1958 年从太原二中初中毕业被保送上高中的。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我的力争，我上不了高中；如果不是阴差阳错，我也到不了太原十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外婆不得不让我和哥哥先后从河南林县到山西太原投奔姨妈家。哥哥早我两年到太原时 14 岁就到煤矿当了工人。我比他幸运，我到太原时 13 岁，才开始上小学。那时我们都吃住在姨妈家，从初中住校开始哥哥每月给我 15 元生活费。1958 年初中毕业时